

论风险研究领域中的社会表征理论

王 磊 伍 麟*

〔摘 要〕 社会表征理论以常识理解新事物为出发点,立足于个体和社会层面的交汇点,关注群体成员互动达成共识的同时允许个体差异的存在,认为表征会在人际互动和时间推移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些特点可以弥补风险感知的不足。社会表征的结构理论、身份理论和三角巧克力模型为风险表征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三角测量法、字词联想法、系列复制法和基本认知图式为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社会表征理论可以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指导理论。

〔关键词〕 风险;社会表征;风险感知

一、社会表征理论对风险研究的适用性

社会表征理论由法国心理学家 Serge Moscovici 提出。Moscovici 认为,社会表征是“带有双重功能的价值观、观念和实践系统:第一个功能是建立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将会使个体能够适应于他们所在的物质和社会世界并控制世界;第二个功能是通过提供对社会交换的编码、对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个人和群体的历史的各方面的明确的命名和分类的编码而使交流能够在社群的成员之中发生”(1973)。一方面,社会表征具有适应功能和交流功能;另一方面,社会表征是信念和行为的整合体,它既是一种符号和信念的系统,也主要是指在某一情境中的交流和互动。

社会表征形成并运行于对新事物的熟悉化,目的是恢复常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社会表征的起源为人们面对新异事物时的不安,这种新异事物对于人们而言往往带有威胁性和不确定性,而风险本身恰好具备这两个属性。风险的出现,威胁着人们的身份和已经建立的秩序,违反了人们对事物的预期,人们无法用已有的知识系统来解释和应对,从而产生不安。为了缓解这种不安,重新构造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世界,社会表征的作用开始突显出来。“当群体或其映像正在经历改变时,尤其是在危机和巨变时,社会表征的特点才会显现。于是人们更愿意交谈,映像和表达更加活跃,集体记忆被激发,行为上也表现得更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激发了个人渴望了解愈加陌生又

* 王磊,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伍麟,心理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30012。本文系吉林省社科基金“风险沟通视域中的信任机制研究”(2012B157)阶段性研究成果。

令人不安的世界的欲望”(Moscovici, 1984)。社会表征的这种观点对风险研究是重要的,首先,常识是公众风险感知和决策的来源,以往的风险研究倾向于将公众认为是非理性的,以社会表征来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决策,有助于公众脱离“缺陷模型”,实现公众和专家之间有效的风险沟通。第二,公众是风险研究的主要对象,风险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公众更好的应对风险。社会表征对常识的建立和运行的重视,以及相应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为研究公众的风险感知和行为提供了理论基础,使风险的研究立场真正回归到公众身上来,而不是集中于风险的类型、公众的认知“缺陷”等方面。第三,社会表征对于建立常识、应对危机是有效的。社会表征的目标是新异事物的熟悉化,使其相容于已有的表征系统,从而获得对该事物的解释,重建有助于有效的交流、适应和控制世界的常识系统,获得一种平衡、放松的状态。

随着风险研究的进一步深化,风险的技术取向(Starr, 1969)已经式微,那种风险取决于某一负面事件发生的概率乘以该事件的后果的量级的观点已经逐渐被很多研究者摒弃,因为这种观点完全将人的内部主观性及其所在的外部环境排除在外,认为只有脱离了这些因素,风险的评估才能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Fischhoff, Slovic, Liechtenstein 等 1978 年发展出心理测量范式,试图解释个体对不同风险的反应的差异以及公众和专家的观点的差异。心理测量范式主要研究个体内部水平的风险感知、风险应对和风险的质化方面之间的关系。前期关注于描述不同风险的“人格画像”,即每一种风险都有其独特的品质,决定了个体的不同的风险感知模式。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是对技术取向的一种改进和扩展,考虑了更多的风险的影响因素,但是,技术取向为人们所诟病的对人类思维的过分简单化的问题仍然存在。于是,后来 Slovic 等人试图将情感因素纳入风险感知的研究中,认为个体使用“情感启发式”来感知和判断风险,即个体根据头脑中“情感库”对所有表征做出的消极/积极的标记来进行判断和决策。

Slovic 等人的努力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风险的心理测量范式,但是这种改进只是旁枝末节的微调,风险感知研究的弊病依然存在。首先,风险感知的研究在本质上依然立足于个体内部的信息加工。虽然有研究者意识到了应该考虑社会文化因素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但只是将这种观念保持在补充的理论解释的层面上,并未真正的融入到研究程序中去;还有一些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引入了情感和价值观的因素,但仍将人看做是“信息的加工者”,只是受情感、价值观的引导去加工信息,而不是具有情感和价值观的人在社会文化背景中主动的建构意义。第二,心理测量范式忽视个体差异和社会文化的影响。以风险的“人格画像”为例,它暗示了个体作为一个整体,会对某种特定的风险作出同样的反应,似乎只有风险的品质才是决定人们风险反应的因素,忽视了个体间差异和社会文化差异。第三,心理测量范式考察的是被试在回答问题这一刻的独立的、静态的风险感知。然而实际上,人们对于某种风险的感知是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并且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随着生活经验的更新而变化。第四,根深蒂固的公众的理性缺陷的观点。风险感知研究的预设立场为公众关于风险的常识性思考相对于专家的理性分析是有缺陷的、非理性的。即使一些研究者后来承认了“情感启发式”在理性风险分析中的作用,也仍然认为以情感启发式为代表的经验系统的使用是在人们掌握的相关信息不足、情况过于复杂、现有认知水平无法应对时所作出的“权宜之计”,它的特点是快速、有效,但也是原始、简单、有干扰性的,只能对理性的分析系统起引导作用。所以,对情感的作用的探索实际上拉远了公众与理性的距离,将认知分析置于情感反应之上。第五,心理测量范式对研究方法和统计技术的过分重视,导致了理论建构的薄弱,“大量心理测量范式的文献集中在方法论和实证结果上,从理论框架的角度解释研究理论却比较弱化”。(Karen, 2004)

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种激进的观点:风

险的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风险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有着各种价值观、世界观的个体在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社会情境中互动形成的,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存在。风险感知是个体所在的社会情境的一种反映。社会共享的世界观,即文化偏见,决定着个体对风险的感知。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世界观选择关注不同的风险。个体被看做是主动的组织者,他们选择害怕什么是为了支持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他们所从属的“文化”。文化理论承认由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群体差异和个体差异,相对于心理测量范式的静止、认知的观点而言是一种进步。但是文化理论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它否认了风险的客观实在性,流于单纯的主观主义,认为风险感知的决定因素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塑造的世界观,不考虑风险自身的性质,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第二,过分注重社会情境,却不能适当的将其融入到实际研究中,仅通过不同类别的世界观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是不充分的。正如 Stoberg 所言,“这种方法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社会情境被以一种非常抽象的、牵强附会的方式所解释,社会情境本身不是风险感知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它是否有影响还有待观察”(2000)。第三,风险的文化理论对社会情境的理论强调和方法简化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导致其理论论证有余,实证支持不足的现状。文化理论缺乏对社会情境因素的有效操作和测量,尽管有研究者试图用实证的方法检验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只是在个体水平上间接的测量了文化相关过程的结果,忽视了文化理论所强调的社会情境、社会关系、行为模式等因素。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认为,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文化过程以可以增强或减弱风险的公众感知和相关风险行为的方式相互作用,导致风险“放大”且产生涟漪效应。SARF 的进步之处在于:一,对于风险的理解是独到的:既承认风险的客观实在性,又承认社会文化的影响。二,作为一个框架,它试图促进实证数据的系统化解释并整合现有的多种风险观点,提出新的假设。社会放大是一个“框架,就像一个

网络,有益于抓住累积的实证结果;又像一座灯塔,可以为训练有素的探究指路”。(Machlis & Rosa,1990)但是,SARF 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一,对风险的“放大”的含义各执一词。SARF 的原始定义认为,放大是指公众对风险事件的逐渐关注和风险感知水平的逐渐升高。还有观点认为,风险的放大是指专家和外行观点之间的不一致。(Breakwell & Barnett,2003) Masuda 和 Garvin 认为,风险的放大或缩小是相对于彼此而言的,不存在随时间的渐变或其他衡量的标准(2006)。风险放大的不同理解所指导的研究各自为战,使整个风险的社会放大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互离散,不能形成共同支撑、充实该框架的实证基础。二,SARF 只是将风险感知嵌入到一个庞大的社会文化框架中,社会情境对于风险感知的研究而言只是一个描述的背景,具体的研究仍然落在了风险感知研究的领域内,因此它难免会带有风险感知的缺陷。三,虽然 SARF 同时关注了风险传播和加工过程中的个体水平和社会水平的作用,但是却把这两个水平孤立起来考察,社会站默认其成员是内部一致的,群体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不存在个体间差异和互动;而个体站则类似于心理测量范式,关注于个体的认知过程。四,SARF 理论宏大,涉及广泛,适用于风险的放大现象的整体描述,但是缺乏对现象的解释机制。

(2) 社会表征的经典理论对风险的解释优势

首先,风险感知主要基于人的认知过程。从个体层面看,风险感知的研究关注于人的认知过程和情感反应,几乎不涉及行为方面,因此,很难体现个体间的互动以及风险的行为模式和行为意向。从社会层面看,风险感知的认知主义倾向使它脱离了社会情境和历史发展,过分重视抽象的认知加工。风险感知带有浓厚认知主义色彩的单纯的“刺激-反应”思维不能够适应深植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风险研究,使它变得孤立静止。社会表征作为一种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和运行的机制,既包含符号和信念系统,又包含交流和行为意向的成分,这两方面都体现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因此,社会表征

天然的和社會文化融為一體,並在個體或群體之間的互動中變化和發展,而不是僅僅將社會文化作為一種背景。社會表征顯然能夠更好的詮釋真實的風險反應。

第二,風險研究領域對風險感知的定義的理解不一致。這種概念的不一致體現為,風險的各理論取向對風險感知的理解相去甚遠,例如,在心理測量範式中,風險感知是人們在情感和價值觀的引導下對風險的判斷和評估,側重於認知加工;在文化取向中,風險感知完全是個體所在的社會文化的一種反映,側重於主體建構;SARF 對風險感知的理解表面上綜合了前兩者的觀點,但實際上風險感知中的認知加工成分和社會建構成分是二元分立的。社會表征的定義相對穩定、統一,一直以 Moscovici (1973) 的定義內容為基礎,幾個主要理論對社會表征的內涵的理解基本一致,只是各有側重的強調了社會表征的名詞性或動詞性含義,它們都承認社會表征的社會性、共享性和動態性。社會表征的研究也在穩定的概念共識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各理論和實證結果相互補充,形成了較完善的研究體系。

第三,忽視由社會文化因素造成的個體差異。風險感知傾向於將反應者看做是原子化的個體,很少考慮他們的樣本群體的社會人口學特徵。風險感知的這種觀點直接導致了心理測量範式的個體內部偏重以及風險的社會放大框架中的社會放大站和個體放大站的分離、社會情境和風險主體的分離。社會表征理論能夠較好的將個體和社會情境結合起來,在個體融入社會的同時,還能保持個體的差異性。

二、風險的社會表征的理論

社會表征的結構理論 (Abrie, 1993; 2001) 認為,社會表征由中央核心和外围元素組成。一個表征的中央核心有兩個基本功能:生成功能,賦予表征的其他基本元素意義和價值;組織功能,決定表征的元素彼此間聯合的聯結的性質。

中央核心具有以下特徵:穩定性和連續性,中央核心是表征的統一的和最穩定的元素,中央核心的所有改變包括一種表征的完全轉變,兩個表征不同,需要意識到它們圍繞着兩個不同的中央核心;它允許表征的比較研究,將其作為不同群體的風險表征存在差異的解釋基礎。歷史性,社會表征的中央核心取決於歷史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情況,與集體記憶和群體規範系統相聯系,從而很自然地将社會文化因素融入了風險表征之中,渾然一體。同質性,中央核心構成了集體共享的社會表征的基礎,它的功能是共識性,一個社會群體通過它獲得了同質性。

外围元素圍繞着中央核心被組織。它們有四個基本功能:具體化,將表征錨定進現實,構成中央核心和具體情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使表征可理解、可傳達。適應,外围元素比中心元素更加靈活,可以通過重新解釋質疑性元素或賦予其新的特徵而將其融入到表征的外围,使表征適應情境的變化。防禦,表征的外围元素通過改變自身來保護核心的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充當了“緩沖器”的角色。異質性,外围元素的靈活性允許個體根據他們的歷史的、個人的和實際的經驗來調整表征,使其成為圍繞着一個共同的中央核心組織的個性化的社會表征。因此,外围元素允許風險表征的個體差異的存在,並賦予其動態特徵。

研究者還提出了社會表征元素劃分的第二個維度:規範性維度功能性維度。(Guimelli, 1998, pp. 209 - 224) 規範性維度,與群體中高度顯著的價值觀、規範和刻板印象有關,帶有意識形態的和歷史的特徵,引導對表征客體做出判斷。功能性維度,涉及個體維持和表征的客體的工​​具性關係,直接與主體發展關於客體的社會實踐相關,引導對表征客體的相关行為。規範性元素在表征的管理中有着更加基礎的、決定性的作用;功能性元素被根據情境性質而不同的激活,可能允許根據情境採取各種不同的立場,與社會實踐的聯繫更加緊密。中央核心的功能性維度的這種特徵類似於外围元素的功能,但不同的是,只有中心元素,無論是規範性的還是功能性的,都經不起反駁,即當中央元素

遭到质疑时,会引发属于该客体的整体意义的崩溃。社会表征的规范性和功能性维度的划分,可以考察人们对某种风险的符号和信念水平上的判断及其风险行为的倾向。

Joffe 的身份理论借鉴了 Kleinian 的儿童精神分析的观点,是一种对社会表征理论的心理动力学扩展。他认为,表征者的身份定位决定了他对某个特定的社会客体的想象力,不同的群体身份导致了同一社会客体的不同的表征。新事物会构成一种威胁,社会表征的出现恰恰是对集体身份的危险的反应,因此,表征的中心目的是抵御威胁。他强调威胁反应的情感根源,当人们面对潜在的危险时,一种焦虑的姿态会开始运转,它会使人们以特定的方式表征危险。(Joffe,2003,p. 62)这种表征的选择源自于自我身份和自尊的保护的动机。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人们会采用一种分裂的机制,使用极化的词语表征他人,将外群体和威胁联系起来,将坏的经验 and 感觉向外投射,好的经验和感觉向内投射,从而保护一种积极的内心世界。社会背景就是将某种感觉状态传递给他人的途径。

社会表征的三角巧克力模型由 Bauer 和 Gaskell 于 1999 年提出。他们认为,社会表征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主体、客体和投射的三元组,可表示为:表征 = $f(S, O, P)$ 。其中, S 为主体或表征的持有者, O 为被表征的客体,一个具体的存在或抽象的观念, P 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投射或实际情境,在其中表征有意义。表征包括的最小的系统是一个三元组:两个人 (S_1 和 S_2),他们都与一个客体 (O) 有关。媒介的三角形 ($S-O-S$) 是意义阐释的基本单元。将一个时间维度(过去和未来)加入到这个基本的三角形中表示投射 (P),投射 (project) 类似于共同命运的经验,表明了共同的利益、目标和活动,可以被看做一项正在进行的活动,一种“尚未”发生的预感,一个“我们的未来”,即人们的感知和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的体现。投射的功能是:通过共同的利益、目标和活动将 S_1 和 S_2 联系起来;投射是主体-客体关系的中介,它明确了客体和人们的经验。分析的基本单元是现在 ($S-O-P-S$),并被描述为“三角巧克力”。

三角形的顶点代表在“原初事实”的意义上的主体 1、主体 2 和客体 O 的指示物。伸长度是联结的投射 P 所暗示的过去和未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穿过三角巧克力的一个截面是一个表示了该客体在该时间的常识意义(表征)的表面。社会群体是动态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媒介的各种三角形出现并且共存,形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在不同的时间上以相互冲突、合作和中立为特征。这导致了“三角巧克力条”模型: O 是不同表征的连接点,是它们共同的指示物或原初事实。每个三角形的平面,通过三角巧克力条的一个截面,表示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在相同的时间上流行的不同的表征。三角形的伸长度表示表征在不同群体中进化。“ O ”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事实上,这条三角巧克力应该是弯曲的,包有不同大小的三角巧克力,伸长的部分是扭曲的,并且可能不同的时间上有着不同数目的三角巧克力。

为了体现群体之间的互动, Bauer 和 Gaskell 在 2008 年将三角巧克力模型扩展为风险玫瑰模型。在这里社会表征被表示为:表征 = $f(\text{主体, 客体, 投射, 时间, 中介, 组间情境})$ 。这个模型认为,主体通常是有意识的自我和他人的一个集合体,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意向性的投射而集合在一起。这些在一个特定的交流中介(通过它形成对某个客体的表征)中体现出来。中介的三角形需要被扩展到组间情境。表征在与其他社群的关系中为了抵抗或支配而形成。因此,“三角巧克力”模型被发展为“风向玫瑰图”。风向玫瑰的花瓣是社会环境,被系统化为中介的三角形,它的大小是不规则的。不同的表征构成了一种可能或多或少有冲突的组间情境。三角巧克力模型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将社会表征的结构和变化体现出来,它的优点在于关注社会表征时间维度上的发展变化,体现了其历史性;三角和玫瑰结构表明了主体、客体、群体之间的互动,体现了其动态性。该模型适用于风险研究。

三、作为风险研究新的指导理论的社会表征理论前瞻

社会表征理论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从理论到实践都尽力克服孤立的、静止的、普适的研究定位,社会表征是个体或群体在某一社会情境下互动的成果,同时也在指导着这种互动。它位于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交汇点,将个人的心理行为和广阔的社会情境融为一体;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形成、变化,且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动态系统;具有良好的组织结构,可以在保持共享核心的前提下允许外围成分的变化和优化,允许差异性存在。这些都使社会表征更加立体化,符合现实中人的存在状态,从而使理论充满活力。

用社会表征理论来研究风险,为风险研究走出以风险感知为研究重心所导致的困境指引了道路。一方面,社会表征探索普通人如何通过常识熟悉新事物,从而恢复常识在认识事物方面的“地位”,这一根本理论定位符合真实的风险研究的要求。社会科学领域内的风险研究的重点并不在于从专家的“理性的”角度以一种俯视的姿态去指摘公众面对风险的“非理性”、规定“正确”的反应标准,也不在于探索人们对不同的风险存在着怎样的反应模式,而是在于从公众的立场出发,理解和分析公众对风险的实际反应的心理和社会原因,帮助公众以他们熟悉和适应的方式来有效的应对风险。另一方面,社会表征理论克服了风险感知的个体的、认

知的、静态的研究取向,认为风险的反应产生于如下过程:面临风险时,带有不同社会文化沉淀的个体和群体通过互动和交流形成了不同的风险表征,从而产生不同的风险应对行为,并且这种风险表征还会随着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此外,社会表征的三个子理论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能够为风险表征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因此,社会表征理论有理由成为风险研究的新的指导理论。

风险的社会表征的未来的研究可着重关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将风险的社会表征理论作为一种解释机制的理论基础融入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中,提升该框架的解释力。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包含风险放大的信息传递和社会反应过程中的诸多心理社会因素,是描述风险现象的一个很好的框架。但是,它对于个体和社会放大站的作用机制的探索能力、对反应机制的解释能力却不强。社会表征理论偏重于因果关系的探索,解释力较好,可以对其进行补充。需要注意的是,考虑二者结合的切入点以及研究方法的选择的问题。二,解释公众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之间的不一致。为什么对于某些风险,公众在认知和情感上已经接受、理解,却不肯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三,一些风险表征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明确,如风险感知是否和态度一样,是风险表征的一个维度,是风险表征的表现形式之一,它的性质和变化依赖于风险表征?明确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开展风险研究。

参考文献:

- Abric, J. C., 1993, "Central system, peripheral system; 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Papers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vol. 2, pp. 75 - 78.
- Abric, J. C., 2001,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K. Deaux & G. Philogène (ed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Bridging Theoretical Tradition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42 - 47.
- Bauer, M. and G. Gaskell, 2008,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A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me for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 vol. 38, pp. 335 - 353.
- Breakwell, G. M. and J. Barnett, 2003,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and the layering method", in N. Pidgeon, R. E. Kasperson & P. Slovic (eds.),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80 - 101.

Brondi, S. , M. Sarrica, R. Cibir, F. Neresini and A. Contarello, 2011, “The Chiampo River 30 years later: Long-term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social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2, pp. 283 – 299.

Fischhoff, B. , P. Slovic, S. Lichtenstein, S. Read and B. Combs, 1978,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 *Policy Sciences*, vol. 8, pp. 127 – 152.

Karen, B. , 2004, “Risk perception research: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he public experience of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vol. 30, pp. 827 – 840.

Wilkinson, I. 2001, “Social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At once indispensable and insufficient”, *Current Sociology*, vol. 49, pp. 1 – 22.

Machlis, G. E. and E. A. Rosa, 1990, “Desired risk broadening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Risk Analysis*, vol. 10, pp. 161 – 168.

Masuda, J. R. and T. Garvin, 2006, “Place, Culture, and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Risk Analysis*, vol. 26, pp. 437 – 454.

Moscovici, S. , 1973, “Introduction”, in C. Herzlich (ed.), *Health and Illnes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9 – 16.

Moscovici, S. , 1984,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n R. M. Farr & S. Moscovici (ed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 – 69.

Starr, C. , 1969, “Social benefit versus technological risk”, *Science*, vol. 165, pp. 1232 – 1238.

Wagner, W. , J. Valencia and F. Elejabarrieta, 1996, “Relevance, discourse and the ‘hot’ stable core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word associ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35, pp. 331 – 351.

(责任编辑: 蒋永华)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in Risk Studies

WANG Lei, WU Lin

Abstract: The current risk studies are conducted by employing such theories as are characterized mainly by the technique orientation, culture orientation and the notion of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s. Though having deep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risks, these theories have some limitations. The fundamental one is that they all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static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risk perception. The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however, uses common sense to understand the new things and regard social representations as the interfac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al level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group members to reach a consensus while allow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t argues that representations will change with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hese features can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s of the risk perception theory. The sub-theories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s, i. e. the structural theory, identity theory and toblorone model,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tudies of risk representations.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like triangulation, word associations, serial reproduction, and basic cognitive schemes, constitute their methodological basis. Thus,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can become a new guiding theory for risk studies.

Key words: risk; social representations; risk perception